

改变

GAIB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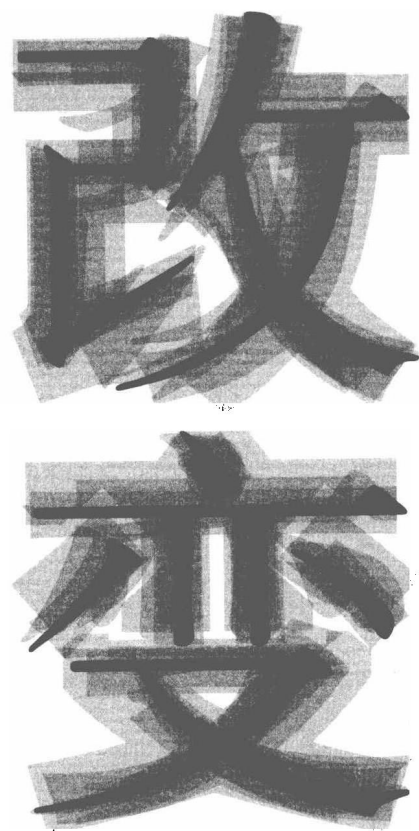
姜文泽 著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Huiwangzhongguo Gaige Kaifang
De Sanshinian

一个小人物生活的改变对整个社会并没有什么影响，
许多小人物生活的改变却能反映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改变……

中国华侨出版社



HUIWANG
ZHONGGUO
GAIGE
KAIFANG
DE
SANSHI
NIAN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姜文泽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变: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姜文泽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222-789-7

I. 改… II. 姜… III. 改革开放-大事记-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4112号

●改变: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著 者/姜文泽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李晓娟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梁小位

责任校对/钱志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开 印张/22 字数/280千字

印 刷/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2-789-7

定 价/3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定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录

第一部分 破冰的大航船

引子：打破灰色的宁静	003
一、改革在艰难中起步	005
二、大幕拉开	009
三、敏感的触角与急躁的脚步	012
四、高考	015
五、鲜红的手印	018
六、特区前传	028
七、深圳速度	032
八、从票证年代开始的觉悟者	044
九、放权与引进	053
十、开始思考人生的一代	057
十一、文化思潮的涌动	062
十二、一群吃螃蟹的勇士	068
十三、应对寒流，重新调整	072
十四、调整道德偏差	077
十五、天才构想	080
十六、“温州模式”	084
十七、偷偷摸摸的工程师	092
十八、历史性的会谈	095

第二部分 跌宕起伏的浪潮

一、解冻	101
二、步鑫生	104
三、面临考验的社会道德底线	109
四、最早射出的利箭——去除国有企业的顽固病症	113
五、请给我们松绑“放权”	117
六、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观念	123
七、无理性的胃口	129
八、涅槃之痛	133
九、民间资本的悲剧	138
十、星火燎原的神州	140
十一、土地的复活	143
十二、资本的觉醒	147
十三、双轨制及谋利者	150
十四、冰冷的铁三角	154
十五、冻土中的萌芽	157
十六、外滩对面的荒地	162
十七、资本市场的大本营	167

第三部分 走进新时代

引子：多彩的春天	173
一、又一场讨论	175
二、残酷的现实	180
三、春天的故事	187
四、招商引资	192
五、股市的最初热情	196
六、理性的回归	203

七、集资狂潮	207
八、疯虎	211
九、摇曳多姿的季节	214
十、膨胀的保健品行业	219
十一、寻找“软着陆”气垫	224
十二、圆一个世纪梦	227
十三、清除蛀虫	231
十四、广告背后的疯狂	233
十五、一条前景广阔的道路	237
十六、大悲与大喜	244

第四部分 融入世界的进程

一、勇闯雷区	253
二、令人叹息的起起落落	260
三、世界开始变小	266
四、诡异的“庄家”	272
五、新世纪到来前的欣喜	278
六、新的千年	285
七、中国的底气	294
八、突来的考验	300
九、一飞冲天	305
十、草根的力量	316
十一、荣辱之年	326
十二、中国的自信	334

<u>尾声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u>	343
----------------------------	-----

第一部分

破冰的大航船

引子：打破灰色的宁静

1977年11月底的一天，北京的天空说不上阴沉，但并不晴朗，没有压顶的黑云，也没有灿烂得令人喜悦的冬日阳光。古城在一片灰蒙蒙的覆盖下，呈现出单调的平静。这种平静并不给人以安详的感觉，而是恍若真空，把这片世界隔离开来。

天安门与端门、午门之间的广场上，照旧是显得有些熙攘的感觉——那时的熙攘自然不能与如今相比，没有一面面三角形的小旗子引领着一批批游客，也没有黄头发白皮肤、手里拿着各式各样数码照相机的外国游客，更听不见各种不同语言的讲解声。人们三五成群，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徒步走在这片广场上。与皇城红墙金瓦的明艳相比，人们身上的颜色似乎更适合这个灰蒙蒙的天气。

李晓斌骑着自行车，挎着国产海鸥相机，徜徉在这片广场上。他的相机配备了借来的进口镜头，是以其优良的质量、不菲的价格闻名于世的德国“莱卡”。为了让进口镜头能与国产机身相配，镜头的底端卡口经过了改装，使德国镜头“嫁接”在中国相机上。相机肚子里面装的，是朋友馈赠的进口柯达反转片，同样是胶片里的“高贵品种”。在1977年，能让相机达到这个配置，是一般的摄影爱好者不大敢想象的。

蓦地，在一片“灰色”中出现了一抹红色。那是一个约摸五六十岁的老者，头上戴着一顶破棉帽，帽子的一只“耳朵”无力地垂下来。棉帽的里面显然还有一顶夹帽，帽舌从棉帽棕黄色的皮毛下皱巴巴地努力伸出来。他身上棉衣的双肩已经漏成两只大洞，穿在里面的蓝色上衣从原本是棉衣领地的地方露出来，看上去像是伤口部位长出的新皮。老者用捆绑纸箱的带子把棉衣扎起来，在腰间系紧，带子绑了一个看上去歪歪扭扭的扣子，一个黑色的包背在他的身后。那一抹最初使人惊异的红色，是三个小碟子一样大的毛主席像章，它们呈一个“V”形挂在老者的胸前。老者似乎有意突出毛主席像章的无上威力，把它们安排在了自己身上最显眼的位置。他的眼神颇有些神经质，里面包含的遭遇、故事，可能是今天的我们所无法读懂、无法辨识的。

李晓斌看到了这个身着“奇装异服”的老者，很显然，在当时身着这样一身“行头”来到北京的人，只有从外地赶来的上访者。李晓斌在回忆自己当时的感觉时这样写道：“当这样一个形象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映入我眼帘时，我立刻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和紧张，只觉得胸口和太阳穴咚咚直跳，手在微微颤抖。我赶快把车骑到他前面约 50 米处，站在一棵大树后，准备好相机。一俟他进入取景框，我连续按了三次快门……第三张拍完，我骑上车掉头就跑，因为我已察觉周围的人对我拍这种形象流露出一不理解的眼光。当时若因此没收相机或胶卷被强迫曝光，是算不上奇闻的。我一边骑车，一边回头看有没有人跟着。为防止意外，我骑车绕了一大圈，确信平安无事，才回到就离拍摄地点不远的家里。冲胶卷时，我也顾虑重重。找私人冲，怕效果不好；送出去冲，又怕冲出来后被没收。我犹豫再三，只好先藏起来，直到 1978 年 2 月，我才把它送到中国图片社冲洗。取卷时，我非常紧张，甚至事先就设想了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取到了照片。当时有朋友预言《上访者》能在 20 年后发表就算不错，但是 9 年后这幅作品就得以公开发表。这就是这个震撼了一个时代和使一个民族反思的拍摄经历。”

李晓斌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段惨痛的时期，紧张的政治空气弥漫在人和人之间。多年的揭发与被揭发、检举与被检举、划清界限与被划清界限，人们的政治神经已经变得分外敏感而脆弱。在高

度集中的体制面前，人们用高度的责任感分辨着是非，用锐利的眼光从报刊的字里行间判断着形势的微妙变化。事实上，在1977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种类总共只有不到200种，加上各种杂志数量也少得可怜，李晓斌的这张照片在这几百家报刊中的任何一家都不可能发表。《上访者》与当时的宣传政策格格不入，即使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超过一年，即使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已经被一举粉碎，批判与被批判仍然是人们生活中的主旋律，“文革”中乃至“文革”前的诸多案件没有经过重新审查，绝大多数在冤、假、错案中受到劫难的当事人冤情没有得到平反昭雪，该落实政策的人们也没有被落实政策。各人民公社下属的大队小队里，社员们还如往常一般劳动，他们耕耘的土地上所种的作物种类和种植的数量，需要经过上级开会讨论确定。全国的大多数工厂都处在恢复阶段，工人们一边继续着阶级斗争，一边按照指标完成工作，每月按照各自所属的级别领取工资。报纸上文章的主题大抵分成两类，一类是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一类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人们依旧在与过去相差无几的环境中，用早已习惯的方式过着生活。

一、改革在艰难中起步

群众开始呼唤邓小平的复出——他在主政期间的“全面整顿”曾使“文革”末期的中国社会精神为之一振。

作为在世界享有盛誉的政治家、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本人三落三起的政治经历，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他在1933年的江西中央苏区，被“左”倾领导人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罗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因抵制当时中央的“左”倾路线而被指为犯右倾错误）。邓小平被撤销党内职务，给予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同时遭受政治打击的还有毛泽东、谢唯俊、古柏三人，连同邓小平一起，被称为“邓、毛、谢、古”。^①

^① 参见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四部分第十三节，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邓小平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文革”开始后，邓小平很快成了“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第一号当权派”刘少奇一起消失在政治舞台上。从1969年10月20日到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与继母、妻子卓琳和儿女、孙辈们在江西省新建县接受劳动改造。1973年3月10日，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传达，邓小平第二次在被打倒后复出。

从第二次复出到第三次被打倒的三年多时间里，邓小平一方面坚决地与“四人帮”为害国家的行为进行斗争，一方面有力地协助周恩来进行经济建设，一度促成了“文革”期间少有的各方面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在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身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负责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时，他开始了“全面整顿”。

翻开《邓小平文选》，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共有九次特别重要的讲话，涉及国家的各个方面。“全面整顿”的重点，是搞好经济建设，把“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梳理干净。首要的工作，就是要获得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要获得这个环境，首先要打击“派性”。

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派性”就是导致发展环境最不安定的因素了，因此邓小平的“整顿”拳头，首先重重地打击了“派性”。在“全面整顿”期间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无一例外地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对“派性”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①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比如在工业方面，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这个文件后来被称为“工业二十条”，主要内容是整顿企业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

管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等等。在教育方面，邓小平对“文革”中全面否定“十七年”（1949～1966）的教育成果，对知识分子全盘否定的“既定方针”提出了质疑。此外，代表科技界的中国科学院，也开始了科学研究秩序的整顿工作。

在邓小平主持下的“全面整顿”，提出了许多与“文革”主流思想不同的意见和方法，终于在一次对“文革”如何评价的争执过后，1975年11月，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始，邓小平长达9个月的“全面整顿”中断了。

事实上，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等老革命家已经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到了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所有职务，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时距“四人帮”被粉碎已有9个月，距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1年零3个月。邓小平奇迹般地第三次复出时，他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但他正是在这之后的20年中，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幕即将拉开。

1978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随后，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届相当特别的会议，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会议的意义之深远，并不亚于在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名称是“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令人相当意外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另一个论断则更加著名，即“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众所周知，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知识分子一直因为“天然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被排除于工人阶级之外，他们对于生产力发展的贡献，不大容易为参与实际生产环节的人们所接受。到了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更加一落千丈，将“臭老九”的帽子顶了相当长的时间。早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已有一部小说在社会上偷偷地流行着，因为不能出版，只能凭借阅读者的热情，用手抄的形式传播于群众之间。因为抄本流行过广，连作者本人都不得不几易其稿，先后改了多次书名。这部小说流传最广的名字，是一名读者起的——《第二次握手》。小说的主角即是一群有志报效祖国，却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优秀科研工作者。作者本人在1976年被捕入狱，据说作者

被捕之前，姚文元曾专门看过这部作品，指出它“很坏”，其目的是要“夺权”。在“文革”结束之后，随着要求提升知识分子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正名”成为“拨乱反正”的重要一环，社会也开始慢慢学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此时《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印数达到了400多万册，这个数字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奇迹。这部艺术成就并不高的作品，因为按对了时代的脉搏，成为了知识分子喷薄而出的热情的最佳寄托。

“全国科学大会”开始尝试改变一种持续了多年的观念，这种观念让国家封闭，成为名副其实的“夜郎大国”。面对西方世界在经济、科技上的迅猛发展，直到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中国人还习惯用“腐朽”、“没落”这样的形容词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冲击。在1978年，美国电影导演乔治·卢卡斯拍摄了《星球大战》。当美国人对他们的科技自信到可以挑战宇宙时，新闻界对这部充满了生气和冒险精神的经典科幻电影，做出了完全负面的评价，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电影走向穷途末路的开端，因为他们只能用刺激眼球的效果和荒诞不经的想象拉拢观众，美国人民不久就会将这种即将死亡的资本主义艺术完全抛弃。

一度被压制的科技由于这次会议显得格外重要起来。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相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在很多方面远远落后。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错过了一段发展的黄金时间，因此要在已经落后的情况下发力追赶。这次会议一下子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相当宏大的远景计划，计划的阶段性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也许是因为突然意识到自身的落后，人们放手追赶的心情实在有些急迫，这个过分宏大的目标到后来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在当时的确燃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激情，人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感受着春天到来的气息，用紧张而激动的心情，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在10月10日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的讲话中，邓小平更明确地表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这篇讲话的题目为《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

先进科学技术》，这又是后来进行开放前的一次小小宣言，所有这些，都在这一年年末的会议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二、大幕拉开

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光芒如今已被在其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盖过。其实，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精神，基本上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结论的延伸。相比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更显得富有战斗性。

那次会共进行了36天。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十项决定，其中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陶铸、彭德怀、杨尚昆等平反，十项决定中还包括撤销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设立的“中央专案组”。“文化大革命”到这个时候才开始被否定，它带来的一系列遗留问题，也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得到解决。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1978年12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本已经是如今的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历史名词，但这个历史名词带来的变革，却还远远没有成为历史，它的活力，至今还跃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对于这次会议，并没有什么需要过多叙述的，邓小平在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实际上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报告的名字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由此报告开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式拉开，等待中国的，将是一个激昂澎湃的三十年。在这出大戏还远没有结束的今天，邓小平在报告中的几句话，仍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①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三个转变，即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这场变革的准备工作其实早已开始。在邓小平复出以后，他的一系列具有改革意味的措施已经引起了境外媒体的注意，世界开始悄悄地关注着中国，大家都想知道，中国到底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发展自己。

在这个国外客人纷纷到来的年份，中国的企业对此绝大多数还茫然无所知。它们自顾自地按照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方式迎接着那些目光犀利的外国人，多少带点无知的自大，固执地认为自己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至少没有血淋淋的剥削。但在关注中国的外国人眼里看来，中国的落后恰恰源于这种毫无生气的企业制度：所有的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性，它们按照国家的统一安排生产产品、安排产量；工人们松松垮垮，早上报到之后，稍微坐坐，看看报纸，聊聊闲天，然后起身走人。虽然从这一年开始，部分企业逐渐恢复了冻结多年的奖金制度，以求达到提高工人工作积极性的目的，但收效甚微。绝大部分的工厂仍然处在“完成任务”的意识中，工人自己也说不清应该生产多少产品，业务员日复一日地与多年来的上级指定合作伙伴打交道，人们不理睬实际上的供求关系，几乎不思考地按照国家安排下的计划做事。

1978年，重庆炼钢厂里的蒸汽式轧钢机还在笨拙地叹息着，这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产品。工厂的领导一点也没有让它休息的意思——事实上，厂长并没有这个权力决定是否引进新设备，一切由国家计划说了算，企业的领导们，只是国家安排的计划执行者，他们如同地方官员拥有行政级别，却不能对企业经营的战略方向提出什么意见。从技术到管理方式，中国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落后。面对此种情况，中国到底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成了境外观察家们感兴趣的课题。日本《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在对中国企业状态作出细致而深刻的观察后，断定中国将开始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

场新的经济革命。他在一篇述评中说“进入建国30年的中国今后的课题是，实行高速经济增长政策，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大国”，中国采取的方法，是“在再度复职的邓小平的领导下，设法加强同外国——以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在国内则推行讲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线。”松永指出，到1978年9月为止，中国已经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访问，并且接待了15个国家的领导人，其中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言而喻，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松永二日把他观察到的事实作为论据，对他的预测进行有力的证明。除了他已经看到的频繁外事活动，中国政府的另外一些举措也让后来的研究者们感到值得玩味。就在这一年，中国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停止了，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也在这一年的12月16日发布。一切的一切都表明，多年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的束缚被中国悄悄地挣脱，寻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成了国家战略的轴心。

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了他当年的出国访问。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出访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到日本的各家企业进行参观。参观自然不是最终目的，这在邓小平归来后中国发生的变化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邓小平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据说日产汽车公司的自动化生产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当时生产线上表现出的繁荣只是日产公司没落内涵外的表象，但中日两国企业显而易见的差距，使得当时的人们无暇深刻剖析外国企业自身的得失，而是关注着追赶，再追赶。

邓小平此行的另一大收获，是会见了当年被称为日本商业神话的松下幸之助——日本松下集团掌门人。74岁的邓小平见到83岁的松下幸之助时，这位“经营之神”的企业已经生产了超过5000万台电视机，各种新型电器琳琅满目，囊括了录音、录像、显示器、音频视频编辑、播放器、现代化厨具、现代化办公设备等多个种类。邓小平为松下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在此后的一年，松下老人就踩着邓小平亲自铺就的中日商业合作锦绣道路来到了中国，他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华的国际级企业家。在中国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之后，通过各种形式的赠送和技术支持，松下电器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在松下幸之助的带头示范下，日本企业纷至沓来，成为开拓中国市场的第一梯队，以致中国的民众对于日本企